

略論院藏〈集字聖教序〉

及其相關問題

何炎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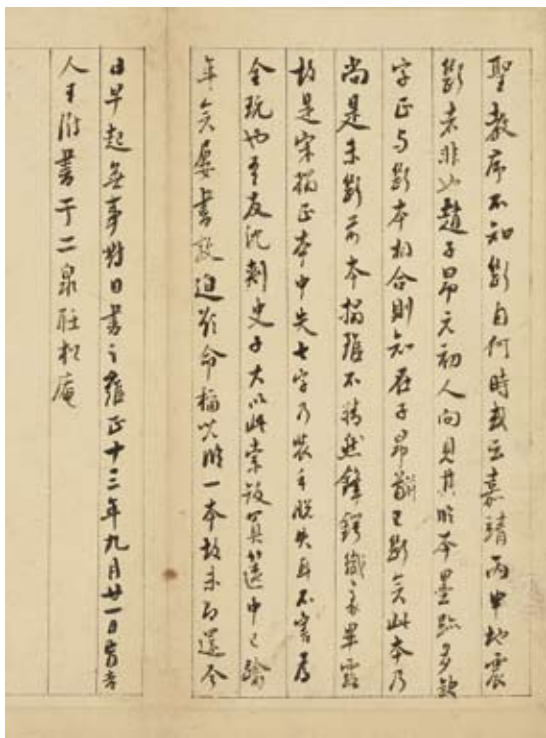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 〈集字聖教序〉第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〈集字聖教序〉碑石現存西安碑林，碑的斷裂年代（圖一）並無確實記載，存在著幾種說法，推測應該是斷於宋、元之間。（註一）傳世拓本中以北宋為最早，過去的研究者已對各時期拓本討論甚詳。（註二）一九七二年於西安碑林所發現的南宋全拓本，十五行末「聖慈」的「慈」損首三筆，二十一行「勝緣」的「緣」字左下與石花連，字跡不如北宋拓肥厚，可以作為判斷兩宋拓本的依據。（註三）

《石渠寶笈三編》延春閣中共著錄三本〈宋搨聖教序〉，此為第一本，亦是其中最佳本。關於此本〈集字聖教序〉（圖二），王澐（一六六八—一七四三）在



圖四 墨皇本〈集字聖教序〉局部
天津市博物館藏



圖三 (清)王澐跋



圖一 〈集字聖教序〉全拓

	北宋拓	院藏〈集字聖教序〉	南宋拓
聖慈			
緣			
顯揚			

表一 院藏〈集字聖教序〉的與南北宋拓本的比較

前副葉跋中，提到當時為沈子大（名起元，一六八五—一七六三）所有，是碑未斷前本，定為宋拓無疑。（圖三）細觀此本，「聖慈」的「慈」字首三筆其實已損，乃是以墨所補出的筆劃。「勝緣」的「緣」字左下也同樣是描摹而成，刻意製造出不與石花連的狀態。若與傳世北宋拓（三井聽冰閣藏王澐題記本）及南宋拓（三井聽冰閣藏崇恩本）相較（表一），可將之

定為南宋拓本。雖非北宋本，然而拓工精謹，筆劃字口也相當清晰，不失為南宋佳拓。另一個重要的添補之處就是「顯揚」的「顯」字左邊，現存筆劃很清楚也是以墨描補，原來左邊部首的左半則是全損。北宋早期拓本「顯」字左上角僅損左豎筆，到了北宋晚期，「顯」字左上「日」則只剩右豎，崇恩舊藏墨皇本（天津市博物館藏）也是以墨補成完整「顯」字（圖四），試圖以北

宋晚期本來冒充更早期的拓本。
〔註四〕院藏本中所出現的幾處墨補處，無非也是想充當北宋早期拓本，冊中題跋的嚴長明（一七三一—一七八七）即將之視為北宋本。

據王翬（一六三二—一七一七）跋，知黃景雲從「延陵」手上獲得此作，黃則在康熙己丑（一七〇九）將之重新裝池。由於延陵為吳氏著名郡望之一，故推測「延陵」所指當為冊中題跋者吳之彥（圖五），據明沈德符（一五七八—一六四二）《萬曆野獲編》卷八記載：「吳侍御慎蒼之彥……吳為王弇州（世貞）從甥……」知與前一跋的慎庵居士（圖五）為同人，是王世貞（一五二六—一五九〇）的從甥，王所收〈褚河南哀冊〉及〈枯樹賦〉後來也都歸吳之彥所有，吳在婁水（太倉）亦是有名的嗜古好事者。此冊後來為沈起元所收，沈起元字子大，號敬亭，

本籍江蘇太倉州。康熙六十年（一七二一）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改吏部主事。擢員外郎，被派往福建，歷官福州、興化，雍正七年（一七二九）署理臺灣府知府事務，雍正十三年由台灣知府護理福建分巡台灣道。沈在福州因處理冤獄時得罪按察使潘體豐，被潘以其他事指控，降職四級，遂辭官歸家。高宗即位（一七三六）後，沈被起用為江西驛鹽道副使。乾隆二年（一七三七），擢河南按察使。七年，遷直隸布政使。九年，入京任光祿寺卿。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，因病離任回家。〔註五〕

雍正十二（一七三四），沈起元將此冊交與王澍索跋，王澍隔年才於「二泉亭」及「二泉聽松庵」書此。無錫惠山寺附近的惠山泉有天下第二泉之稱，二泉亭位於上池和下池之上，而聽松庵則是在惠山寺左面。下池北邊牆上有一「天下第一泉」大字題刻，即為王

澍手書，他也自號二泉。沈退休後，曾至山東濟南趵突泉畔的濼源書院講學，根據金德瑛（一七〇一—一七六二）的跋（一七五三），知此冊也在隨行之列。一七八一年嚴長明跋時提到，因沈起元少子且為官清廉，故後人將此讓與畢沅（一七三〇—一七九七），以處理其身後事。畢沅本人也收藏過數本宋拓聖教序，但多為鑑賞家索去，僅存二本。沈起元這本後來畢沅又送還給沈的曾孫礪師，礪師同時也是畢沅的外甥。晚至一七八六年，周升桓（一七三三—一八〇一）跋時，此冊尚在沈礪師手上。嘉慶時（一七九六—一八二〇）進入內府收藏。兩百多年前，此拓本為台灣知府沈起元所收，不知曾否到過台灣，然隨文物播遷來台，現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中，堪稱文物收藏之佳話。

此碑內容不獨唐太宗（五九九—六四九）所撰〈大



圖五 (明)吳之彥與(清)王樹跋

唐三藏聖教序〉，尚有太宗箋答、高宗（六二八—六八三）〈皇帝在春宮述三藏聖記〉、高宗箋答、玄奘（六〇二—六六四）奉勅譯〈心經〉。唐

《廣弘明集》收有太宗〈三藏聖教序〉、玄奘〈謝勅齎經序啓〉、太宗〈答謝齎經序啓〉、高宗〈述三藏聖教序〉、玄奘〈謝皇太子聖教序

述啓〉、高宗〈答法師玄奘謝啓書〉六篇文章。顯然碑中未收玄奘兩篇謝啟，高宗〈述三藏聖教序〉則名為〈皇帝在春宮述三藏聖記〉。有學者認為除〈三藏聖教序〉為懷仁集字外，其餘部分均存疑，且集字與咸亨三年（六七二）的立碑分屬兩事，並指出現存碑林之〈集王聖教序〉是立於千福寺之碑刻，而非當初立於弘福寺之石。（註六）

此碑長期以來被視為懷仁所集，因碑文有「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年八月三日內出」，至咸亨三年才立碑，其間經時二十五年之久，故有貞觀集書，咸亨刻石之說（郭宗昌《金石史》），也有認為因為需要組合偏旁與調整大小，故須花費二十多年才完成（王昶《金石萃編》），日本學者則提出顯慶元年（六五六）後開始集字的說法。（註七）有關「內出」的說法，清王澐在《竹雲題跋》中論之甚詳：文皇之序，降於貞觀廿二

年八月，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，十月乃還，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。又塔銘稱：「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。」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，故於述聖記之末總而記之曰：「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。」

貞觀二十二年六月玄奘離開弘福寺前往玉華宮（長安北六百餘里玉華山麓之離宮）時，方得太宗及高宗兩篇序記。碑文中提到「貞觀二十二年八月三日內出」，意指序記製作完成後約兩個月才從玉華宮公佈出來。

根據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：

釋彥棕（約六一〇—六九〇）箋述曰：「自二聖序文出後，王公、百辟、法、俗、黎庶手舞足蹈，歡詠德音，內外揄揚，未決辰而周六合，慈雲再蔭，慧日重明，歸依之徒波迴霧委。所謂上之化

下，猶風靡草，其斯之謂乎！如來所以法付國王，良為此也。」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，請鑄二序文於金石，藏之寺宇。帝可之。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，勒於碑石焉。

可知二序文完成公佈之後，弘福寺主圓定及京城僧侶才請鑄碑石，方由弘福寺寺懷仁等僧人集書刻石，藏於寺宇。按照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的行文順序，接下來的文字都還是在談貞觀間之事，故「帝可之」的皇帝當指太宗。北宋周越《書苑》：

唐文皇製《聖教序》時，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，累年方就。逸少劇蹟，咸萃其中。

也是認為是太宗時開始製作。因隔年（六四九）五月太宗即過世，從公佈的八月到隔年五月，短短七個月，懷仁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集字完畢，

故推測集字完成時間應當在高宗時期較為合理，不過似乎也不至於拖二十幾年才完成。事實上，碑文中稱高宗為「皇帝」，亦可證明此碑集字的完成確實在高宗朝。

雖然文中提到「藏之寺宇」，但並未提到立碑於何寺，且請立碑石的人除了弘福寺寺主圓定，還有其他的京城僧侶，所以很可能是廣立於城中佛寺中。從現存碑中「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」及「京城法侶建立」，也無法得知碑立於何處。唐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中《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》：

千福寺在安定坊，會昌中毀寺後，御置不改舊額。寺額，上官昭容書毀寺後，有僧收得再置，御懸之。中三門外東行南，太宗皇帝撰聖教序弘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書。西行梵

金和尚法華感應碑顏魯公書，徐浩題額。碑陰沙門飛揚撰，吳通微書。提到千福寺有《太宗皇帝撰聖教序》。唐韋述（？—七七七）《兩京新記》：「安



圖六 〈集字聖教序〉第二十五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定坊東南隅千福寺本章懷太子宅，咸亨四年捨宅立為寺。「知千福寺原為章懷太子宅第，咸亨四年才捨宅為寺，故時間上晚於此碑咸亨三年所立之時間，但亦不排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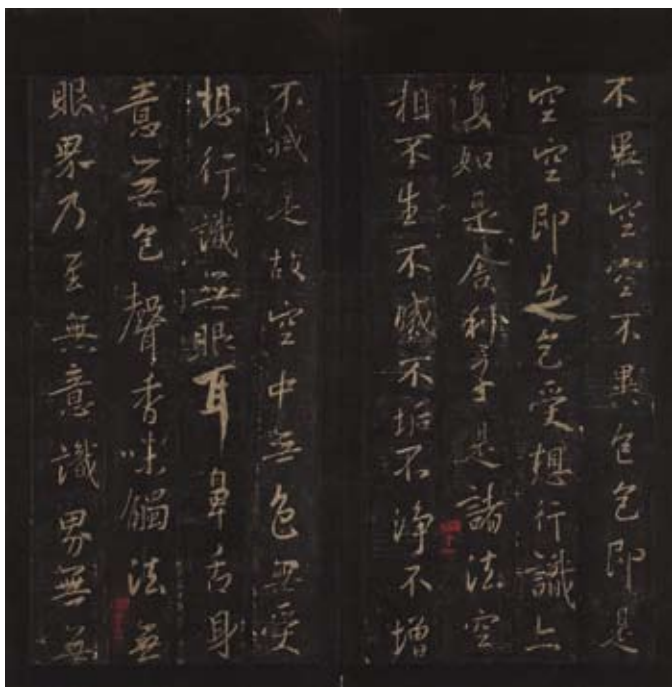
除由它處將此碑移來。此外，韋述《兩京新記》也提到弘福寺：

寺內有碑，面文賀蘭敏之寫《金剛經》，陰文寺僧

懷仁集王羲之寫《太宗聖教序》及《高宗述聖記》，為時所重。

這方面刻有《金剛經》的〈集字聖教序〉與現存碑石完全不同，故有學者認為千福寺碑才是現存碑石。顯然，根據懷仁當年集字所刻的〈集字聖教序〉碑時確實不只一方。

彥棕的文字還顯示其他重要訊息，即當年懷仁所集可能只有太宗與高宗的兩篇序文。事實上，除了〈集字聖教序〉（六七二）外，尚有褚遂良（五九六—六五八）永徽四年（六五三）〈雁塔聖教序〉、龍朔三年（六六三年）〈同州聖教序〉，王行滿（高宗時人）顯慶二年（六五七）〈聖教序並記〉。慈恩寺的〈雁塔聖教序〉將序、記分為兩碑書寫，另外兩方碑石則將序、記兩篇書寫於一石。這些年代較〈集字聖教序〉早的〈聖教序〉，內容都僅止於兩篇序記，與現存碑石紛雜的內容差異甚多。



圖七 《集字聖教序》第二十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玄奘於永徽三年春請建石浮圖以安西域之經像，後建成磚造雁塔，於南面立此《雁塔聖教序》二碑。樹此二碑的意義，玄奘說得相當清楚：

先皇道跨金輪，聲振玉鼓，紹隆象季，允膺付屬，又降發神衷，親裁三藏之序，今上春宮講道，復為述聖之記，可謂重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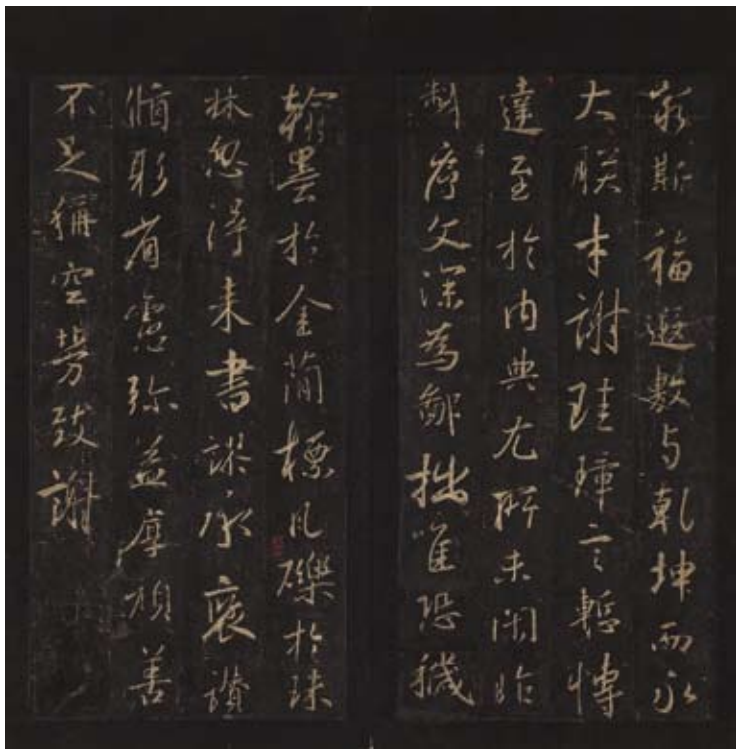
合璧，振彩聯華，渙汗垂七耀之文，鏗鏘韻九成之奏。自東都白馬，西明草堂，傳譯之盛，詎可同日而言者也。但以生靈薄運，共失所天，唯恐三藏梵本，零落忽諸，二聖天文，寂寥無紀，所以敬崇此塔，擬安梵本，又樹豐碑，鐫斯序、記，庶使巍峨永劫，願千佛同觀，氤氳聖跡，與二儀齊固。

（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七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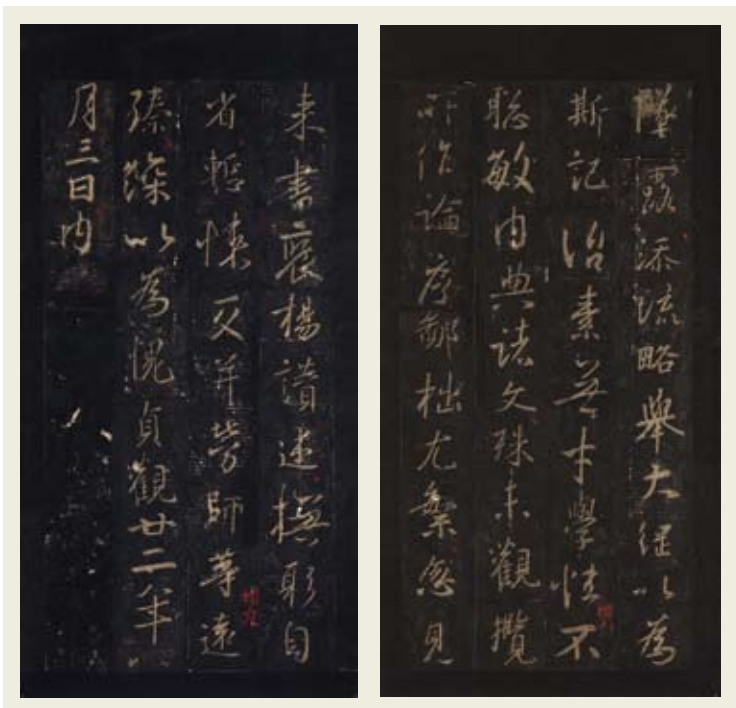
他希望此兩篇序記可以與「二儀齊固」，因此現存碑石多出來的部分，就與玄奘的本意有所出入。由於玄奘在弘福寺翻譯過一段時間，若說請立碑石的僧人或懷仁不清楚玄奘對兩篇序記的觀點也很奇怪，故多出來的部分就暗示此碑製作的脈絡已改變。研究者亦同時指出現存碑末《心經》的諸多謬誤，有認為是懷仁之過，亦有認為出自他人之手所造成。顯然，兩篇序記在高宗前期是被

視為完整的一組內容，到了高宗後期，現存的五段內容已被組合於一起，賦予了不同的意義，至少立此碑的「京城法侶」（圖六）是清楚其中的原由。

事實上，就現存《集字聖教序》拓本仔細觀察，也可以發現五段文字在書風上稍有出入。太宗所撰《三藏聖教序》與高宗《述三藏聖記》，在風格上講究典雅端正，《心經》及其後名銜的集字則摻用較多敬側誇張且用筆豪放的單字，而太宗與高宗的箋答亦有類似的傾向。兩篇序記的部分，集字者在選字及組合時皆秉持著一貫的審美要求，所採用單字多端莊雅正，較少用筆放逸與結字奇特的單字，即使少數特例也都盡量與整體協調。然而，像《心經》中「空即是色」的「是」字、「無眼耳鼻舌」的「耳」字（圖七），太宗箋答中的「謝珪」、「拙」、「翰」、「書」、「乘衰」等字（圖



圖八 〈集字聖教序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〈集字聖教序〉第十九、二十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八），高宗箋答中的「無」、「撫」字（圖九），在結字或用筆上都比較放縱不拘，產生較強烈的視覺衝擊及不協調感。「心經」的部分或許可以解釋為重複字太多，故集字者選擇不多，才會採用風格與兩篇序記不類的字。不過，兩篇箋答與人名結銜的部分似乎不

存在這個問題，卻依然在選字標準上接近「心經」。清楚楚在著兩種選字邏輯的〈集字聖教序〉，確實可能非出自懷仁一人之手。

〈集字聖教序〉末有「文林郎諸葛神力勒石」、「武騎尉朱靜藏鑄字」。（圖六）刻碑者朱靜藏的資料不多，「武

騎尉」為武散官名，當於從七品。至於諸葛神力，其銜「文林郎」為文散官，從九品。從此碑的水準看來，兩位當屬一流刻碑好手。諸葛神力雖然摹勒這方影響書法史甚巨的名碑，卻沒沒無聞。所幸近年在江蘇丹陽大泊發現了《諸葛氏族重修族譜》，此譜修於光緒

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，從譜中得知諸葛神力的親兄弟即為諸葛貞，其父親為諸葛嘉會（唐初賜義民官），其祖父諸葛穎（五三六—六一二）。唐何延之《蘭亭記》：「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、韓道政、馮承素、諸葛貞等四人，各搨數本，以賜皇太子、諸王、近臣。」另唐武平一《徐氏法書記》：「至高宗，又勅馮承素、諸葛貞搨《樂毅論》及雜帖數本，賜長孫無忌等六人。」

一知諸葛貞活動於太宗及高宗朝，工於摹搨古碑帖，為宮中重要的搨書手。據該譜記載，諸葛貞的官銜亦是文林郎，任職於弘文館。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中也記載有同樣任文林郎的張龍樹，則是宮中裝潢匠，從太宗朝到玄宗時（七一—七五六）都從事裝潢工作，曾幫玄宗重裝搜求來的書畫。頭銜同為文林郎的諸葛神力，應該與其兄諸葛貞一樣都是內府供奉。該譜記載諸葛神力為永徽三年（六五二）

進士，官平江尹，太宗嘗命鑄《聖教序》。不過此處可能有誤，因為此記載若屬實，表示在永徽三年進士及第前，諸葛神力已任職於太宗內府。然而在考取進士後二十年的咸亨三年（六七二），卻仍任低階的文林郎，顯然不合常理。

諸葛神力除了諸葛貞這位兄弟外，其祖父諸葛穎也值得介紹。諸葛穎，字宗漢，丹陽建康人。年十八能屬文，起家邵陵王參軍事，隋煬帝（五六〇—六一八）為晉王時，聞其名引為參軍事。煬帝即位，遷著作郎，甚見親幸，出入臥內。諸葛穎任晉王參軍事時，與柳顧言、虞世南（五五八—六三八）等人一起共事。詳細事蹟見《隋史》中傳。他也與柳顧言、釋智果一起成為當時重要的鑑書人，現存王羲之《平安何如奉橘帖》即有三人之題識（圖十）：

開皇十八（五九八）年三月二十七日。參軍學士諸葛穎、諮議參軍開府學士

柳顧言、釋智果。

此帖為北宋初駙馬都尉李瑋舊藏，米芾（一〇五二—一一〇八）《書史》中也記錄此段題識。明汪砢玉《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》中提到元袁泰家藏的《洛神賦》舊刻，同樣有三人於開皇十八年三月廿七日題識，可知他們在當天不止過目一件作品。

現存《集王聖教序》無疑為王羲之刻石中之最，將此碑與《喪亂帖》、《得示帖》（日本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藏）、《頻有哀禍帖》、《孔侍中帖》（日本前田育德會藏）、《平安何如奉橘帖》中相同的字加以比對，發現確實是形神兼具，（註八）當年集字字庫應取自內府收藏真蹟。（註九）雖然不清楚懷仁如何集字，若考慮太宗時為了製作大量王羲之摹本，宮中已有一批專職的搨書手，因此懷仁要取得所需摹本必定不難。刻碑前，懷仁必須事先完成兩篇序記的集字，才能摹勒上石並鑄刻。由



圖十 (晉)王羲之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於京城不只一寺刻有〈集字聖教序〉，且懷仁直接使用了內府收藏，或許完成的〈集字聖教序〉底本可能保存於內府，待有刻碑需要時再利用此本上石。如此便能保證每次刻石時都可以維持如首刻般的品質，不會產生輾轉摹刻的失誤，否則現存〈集字聖教序〉怎會有如此高的水準。除了懷仁等人的集字功勞外，上石及鐫刻者當然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從傳世王羲之雙鉤摹本的品質，(圖十)不難想像諸葛

貞這些搨書手的水準，同理可推諸葛神力摹勒上石的逼真及朱靜藏的高超刀法。

諸葛神力家族跟王羲之確實淵源頗深，祖父為隋代重要鑑書家，兄長為〈蘭亭序〉搨書手，他自己則是〈集王聖教序〉的上石者。顯然，隋、唐之際王羲之書風的傳遞與保

存過程中，諸葛家確實扮演背後的實際推手。而〈集王聖教序〉的完成與流傳，不僅保存了大量可靠的王羲之書法外，更成為後世學習王羲之的重要範本，同時也反映出太宗對王羲之的鑑賞品味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註釋：

1. 張彥生，〈懷仁集王書《聖教序》拓本概述〉，《文物》，1963年第3期，頁36。
2. 王壯弘，〈懷仁集王書三藏聖教序並心經〉，《增補校碑隨筆》(臺北：華正書局，1985)，頁530-535。
3. 劉最長、朱捷元，〈西安碑林發現女真文書、南宋拓全幅集王《聖教序》及版畫〉，《文物》，1979年第5期，頁3。啟功，〈《集王羲之書聖教序》宋拓整幅的發現兼談此碑的一些問題〉，《啟功書法叢論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3)，頁109-113。
4. 馬子雲、施安昌，〈懷仁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並多心經碑〉，《碑帖鑑定》(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3)，頁274-275。
5. (清)高其倬，〈福建總督高其倬奏聞事摺〉，《雍正硃批奏摺選輯(二)》，收於《臺灣文獻叢刊300》(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)，頁183；《清史稿》(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)，卷300，頁10431。
6. 王煥林，〈《集王聖教序》說異〉，《書法研究》，1979年第5期，頁84-94。
7. 西林昭一，〈集王聖教序〉，《中國法書ガイド16 集字聖教序 東晉 王羲之》(東京：二玄社，1987)，頁12-13。足立豐，〈集王聖教序について〉，《書道技法講座〈行書〉 集字聖教序》(東京：二玄社，1990)，頁2-3。
8. 〈快雪時晴帖〉並非鉤摹本，應為臨摹本，所以與〈集王聖教序〉有較大出入。至於〈蘭亭序〉，目前所有版本皆與〈集王聖教序〉所以稍有出入，詳細討論請參考：喻衡，〈從懷仁集《王聖教》試析《蘭亭序》之疑〉、張昕若，〈王羲之書法真面目的一些探討〉、許莊叔，〈《蘭亭》真賞〉、曹寶麟，〈《集王聖教》與《神龍蘭亭》之比勘〉，《蘭亭論集》(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0)，頁37-39、42-46、107-116、377-386。鄭聰明，〈試論集字聖教序的體勢特徵〉(臺北：臺北市教育局，1987)，頁139-152、11。
9. 中田勇次郎，〈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〉(東京：二玄社，1979)，頁268-269。